

研究論文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 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路淼、羅文輝、魏然

摘要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虛假資訊成為香港社會日益關切的焦點議題。結合「預設影響之影響」(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IPI)與「資訊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本文旨在探究香港市民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媒介接觸、思考、預設影響，以及他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共訪問1,017位香港市民。研究結果發現，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既可以直接預測市民的三種態度與行為模式，包括對限制虛假資訊的支持、對虛假資訊的糾正，以及對正確資訊的推廣，也可以透過「對虛假資訊的思考」與「對他人的預設影響」來間接預測這三種態度與行為模式。此外，

路淼，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數字文化與社會。電郵：miaolu@ln.edu.hk

羅文輝，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訪問教授。研究興趣：媒介效果、健康傳播。電郵：lovenhwei@hkbu.edu.hk

魏然，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席教授。研究興趣：媒介效果、傳播科技、移動傳播。電郵：ranwei.usc@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2年3月1日。論文接受日期：2022年9月13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本研究發現對虛假資訊的思考可以預測虛假資訊對他人的預設影響，進而影響市民的態度與行為。本研究不僅拓展了預設影響之影響模型與資訊處理理論的適用範疇，還為政府應對、管理疫情虛假資訊提供了參考性建議。

關鍵詞：虛假資訊、接觸頻率、預設影響之影響、資訊處理、抗疫行為策略

Research Article

Countering COVID-19 Misinformation: An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Study in Hong Kong

Miao LU, Ven-Hwei LO, Ran WEI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re has been growing concern over misinformation and its potential effects on the Hong Kong public. Combining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model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isinformation exposure, elaboration of misinformation,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and Hong Kong citizens’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mis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Based on an online survey of 1,017 Hong Kong citize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exposure to COVID-19 misinformatio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ed three types of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restrictive, corrective, and promotional—but also indirectly predicted thes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of misinformation. The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the elaboration of misinformation predicted the influence of

Miao L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digital culture and society.

Ven-Hwei LO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effects, health communication.

Ran WEI (Chair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obil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5 (2023)

presumed misinformation on other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umed influence framework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misinformation. The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al policy on the management of misinformation are discussed.

Keywords: misinformation, exposur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behavioral strateg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u, M., Lo, V.-H. & Wei, R. (2023). Countering COVID-19 misinformation: An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study in Hong Kong.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5, 191–217.

致謝

本項研究得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委員會的資助(項目編號: C4158-20G)。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研究動機與目的

伴隨著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各地，大量有關疫情的虛假資訊 (misinformation) 也借助各類媒介平台迅速擴散，引發一場「信息疫情」 (infodem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給各國的疫情防控帶來巨大挑戰。在香港，虛假資訊並非新現象，但在新冠疫情期間變得更為嚴重，使其成為政府及社會各界日益關注的焦點議題 (香港立法會，2021；楊澄璋，2021)。

廣義而言，「虛假資訊」指具有誤導性、不能準確反映真實現狀的信息，而不管傳播者是否具有惡意 (參見：Freelon & Wells, 2020; Wardle & Derakhshan, 2018)。虛假資訊不僅會干擾人們對正確信息的接收，影響人們對疫情的認知，還可能引起恐慌與懷疑，進而觸發一些態度與行為改變。例如，受內地生產線停工的謠言影響，香港市民曾多次搶購衛生紙等生活用品。¹香港浸會大學關於香港市民「疫苗猶豫」 (vaccine hesitancy) 的報告中，將接觸新冠疫苗的錯誤資訊視為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²在疫情資訊紛繁複雜、真假難辨的情況下，香港市民如何應對虛假資訊？接觸虛假資訊會如何影響對他人影響的感知，進而影響他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目前尚未有研究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本研究試圖通過對香港市民的問卷調查來回答上述問題。

借鑒「預設影響之影響」模型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簡稱 IPI) 與「資訊處理理論」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本文提出一個新的整合研究，嘗試探究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媒介接觸、思考、預設影響如何影響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本文有兩個主要研究目的。第一是考察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如何影響香港市民對他人影響的認知，進而影響自身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策略。鑒於新冠病毒是一種呼吸道傳染病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可通過飛沫或者接觸傳播，在社會交往密切的大都市，他人如何行動往往會波及到自身。當人們在面對不確定的疫情與資訊來制定行動決策時，通常會將他人的可能反應也納入考慮範圍之內 (Cheng & Luo, 2020)。因此，本研究認為，香港市民所感知的虛假資訊對他人的影響會影響他們自身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在疫情期間的態度與行為。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探討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如何影響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思考、對他人影響的認知，以及自身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通過整合 IPI 與資訊處理理論，本研究不僅拓展了這兩個理論的適用範疇，也為理解人們在虛假資訊環境中的認知與行為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徑與解釋視角。此外，現有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虛假資訊的限制 (restriction) 與糾正 (correction) (Baek et al., 2019; Ho et al., 2022; Koo et al., 2021; Sun et al., 2022)，大多數研究關注其中一種或兩種態度與行為效果，而較少關注對正確資訊的推廣 (promotion)。在本研究中，我們同時考察了上述三種態度與行為策略，這不僅可以拓展對虛假資訊可能引起的態度與行為效果的研究範圍，也可為政府應對、管理疫情虛假資訊提供更多的政策性建議。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預設影響之影響 (IPI)

在傳播學領域，Davison (1983) 提出的「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 假設常被用來解釋媒介訊息對人們認知與行為的間接影響。該假設認為，人們傾向相信媒介訊息對他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而這種第三人認知偏差可能會促使人們採取某些行動。大量後續的研究表明，「第三人效果」在感知 (perceptual) 層面普遍得到驗證，而在行為 (behavioral) 層面則結論不一，仍存爭議 (Chung & Moon, 2016; Lo & Wei, 2002; Perloff, 2009; Schmierbach et al., 2011; Sun et al., 2008b; Xu & Gonzenbach, 2008)。例如，雖然大量研究證實，有關媒介暴力或色情內容的第三人效果感知可以有效預測人們是否支持媒介審查 (Hoffner & Buchanan, 2002; Lo & Wei, 2002)，但當研究者拓展到媒介審查以外的話題或領域時，第三人效果感知對人們的行為則不一定會有顯著的預測力：有些研究發現第三人效果感知對行為只有部分或有限的影響，有些研究甚至發現沒有影響 (Sun et al., 2008a; Xu & Gonzenbach, 2008)。有鑒於此，Gunther 與 Storey (2003) 提出 IPI 理論模型，他們認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為，人們預設媒介訊息會對他人產生影響，進而根據這種預設影響調整自己的態度或行為。在這一模型中，媒介訊息對接觸者自身的影響與第三人效果感知不再是產生媒介效果的必要條件。他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即使人們未被某一訊息勸服，或他們所感知的「對他人的影響」未能大於「對自己的影響」，只要人們覺得別人有可能會被影響，他們就有可能因此調整、改變自己的態度或行為。也就是說，IPI理論模型將「對他人影響的感知」(perceived effects on others)作為預測行為的主要顯著變量。相較於「第三人效果」假設，IPI理論模型更加簡潔、邏輯性更強，因而被廣泛地用來研究間接媒介效果，尤其是關於資訊對人們行為層面的影響。

I. IPI與三種態度/行為模式

大量研究表明，IPI可以在多種社會場景下預測人們的態度與行為，如對媒介審查的支持 (Tal-Or et al., 2010)、環保態度與行為 (Liao et al., 2016; Yang et al., 2021)、吸煙行為 (Gunther et al., 2006)、青少年飲酒行為 (Ho et al., 2014)、策略性投票 (strategic voting) (Cohen & Tsfaty, 2009)，以及對政府全球公關戰略的支持 (Wei et al., 2017) 等。

根據Sun等人(2008b)的分析，IPI所引發的態度與行為變化主要包括三種類型：限制性(restrictive)、糾正性(corrective)以及推廣性(promotional)。限制性態度或行為是指對負面或有害內容的限制或審查，這是第三人效果研究關注最多的一種態度與行為模式，如對暴力、色情內容審查的支持等 (Hoffner & Buchanan, 2002; Lo & Wei, 2002)。糾正性行為指當人們感知到媒介訊息會產生某種不好的後果時，他們會通過線上或線下的活動來糾正這種偏差或者錯誤 (Barnidge & Rojas, 2014; Rojas, 2010)。例如，當選民感知到公共輿論偏離他們所預期的方向時，他們會積極參與政治討論 (political talk)，以期扭轉公共領域的輿論導向 (Barnidge & Rojas, 2014)。推廣性行為一般針對正確信息或正向行為；當人們感知到這類訊息在公共領域中的影響不足或未達預期時，他們有可能會對其進行推廣和宣傳 (Sun et al., 2008b)。例如，當人們感知到有關預防愛滋病的公益資訊對身邊朋友以及公眾的影響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時，他們可能會通過宣傳、推廣這些公益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資訊來擴大其影響力。上述這些研究發現對於探究虛假資訊環境中人們的態度與行為變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II. IPI 與虛假資訊

作為亞洲重要的商業與金融中心，香港資訊發達，媒體種類繁多。其中，網絡平台尤其是社交媒體，是香港市民最常用的資訊來源，使用比例高達85%；³與此同時，網絡與社交媒體亦被視為是散播虛假資訊的主要渠道。益普索公司 (Ipsos) 在2019年的調查表明，64%的香港網民曾在互聯網上接觸過假新聞，58%的受訪者曾在社交媒體上看過假新聞。⁴

大量媒介效果的研究表明，接觸特定媒介內容 (media exposure) 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們的態度與行為 (羅文輝、蘇蘅，2011；Lo & Wei, 2005; Wei & Lo, 2008; Wei et al., 2008)。例如，一項有關台灣的研究發現，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台灣民眾對政府資訊的接觸越多，他們對政府效能的感知越強，也更願意採取預防性措施，從而減少了對疫情的擔憂 (Chang, 2022)。另一項關於美國成年人的實驗研究發現，接觸疫苗虛假資訊會增加人們對疫苗風險的感知，從而降低他們對疫苗的支持度 (Featherstone & Zhang, 2020)。由於2019新冠病毒是一種新型病毒，人們對它的了解非常有限，在缺乏正確資訊的背景下，對虛假資訊的接觸可能會直接影響人們的態度、決策與行為，造成一定的社會後果。例如，Bursztyn 等人 (2020) 研究了美國不同地區對福克斯新聞網 (Fox News) 兩檔新聞類節目的媒介接觸，發現在疫情早期接觸到更多淡化、否定新冠病毒危害性資訊的美國地區，出現了更多的確診與死亡病例。有鑒於此，我們認為，當人們在媒介平台上接觸到有關疫情的虛假資訊時，考慮到這類資訊的潛在社會後果，他們可能會直接調整自身對虛假資訊的態度並採取多種行動來限制、糾正或預防虛假資訊可能產生的社會後果。

據此，本研究提出第一組研究假設：

H1：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可以預測受訪者 (a) 支持政府限制虛假資訊、(b) 糾正虛假疫情資訊的行為，以及 (c) 推廣正確疫情資訊的行為。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此外，已有研究也證實，媒介接觸會影響人們對他人的預設影響，進而間接引發態度與行為變化。例如，Wei等人(2008)的研究發現，對禽流感新聞的媒介接觸不僅可以預測這類新聞對受訪者自身的影響，也可以預測受訪者對於他人的預設影響，並促使他們進一步去尋找有關禽流感疫苗的訊息。Wang與Kim(2020)關於新聞網站上不文明留言的實驗研究也證實，相較於對照組，接觸到不文明留言的實驗參與者更傾向認為他人會受到此類留言的影響，從而更願意支持評論審查。關於媒介接觸如何引發對他人的預設影響(presumed influence)，目前較為信服的解釋是通過增強對他人所預設的媒介接觸(presumed exposure)(Cho et al., 2021; Eveland et al., 1999; Gunther et al., 2006; Hoffner & Cohen, 2015; Hong, 2023)。也就是說，當人們對某一媒介訊息的接觸頻率越高時，會對他人預設更多的媒介接觸，而更多的預設媒介接觸可以預測更多的預設影響(Hong, 2023)。結合相關文獻與IPI理論模型，本研究認為，在新冠疫情的語境下，人們對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越多，他們越傾向於預設虛假資訊會對他人產生越大的影響。據此，本研究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

H2：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可以預測受訪者所預設的虛假資訊對他人的影響。

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關注假新聞(fake news)、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與虛假或錯誤資訊(mis/dis-information)的社會影響。這些研究已經初步證實，人們會根據所感知到的虛假資訊對他人的影響來調整自己的態度與行為(Baek et al., 2019; Ho et al., 2022; Koo et al., 2021; Sun et al., 2022; Lo et al., 2022)。例如，Ho等人(2022)對新加坡科學家的研究表明，當科學家們預設虛假科學新聞會對其他科學家以及公眾產生更大影響時，他們會傾向於支持政府通過立法或者教育項目來限制虛假新聞的傳播，減輕虛假資訊的社會危害。類似地，Baek等人(2019)的研究揭示，韓國民眾對假新聞的預設影響可以預測他們對相應法規的支持，以管制假新聞的創作者與分享者。這些研究說明，人們所預設的虛假資訊對他人的影響會促使他們支持相關部門對這類資訊進行限制。不過，學者們對虛假資訊糾正性行為的研究發現卻不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致。例如，Koo等人(2021)的研究發現，第三人效果感知能夠激發美國民眾採取行動去糾正網絡虛假資訊，不僅包括糾正他人發布的虛假資訊，也包括糾正自己曾經發布的虛假資訊。而Sun等人(2022)對美國疫苗支持者的調查卻發現，受訪者所感知的「反疫苗」(anti-vaccination)虛假資訊對他人的影響可以預測他們對這類資訊的限制性態度與行為，卻不能預測糾正性行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有關疫苗的議題涉及大量專業知識，而普通民眾可能沒有足夠信心保證他們對相關疫苗資訊的糾正準確無誤，不會誤導他人。這些研究結果顯示，虛假資訊對糾正性行為的影響是一個複雜過程，有待進一步探究。

此外，目前對虛假資訊的預設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限制與糾正這兩種類型，較少有研究關注對正確資訊的推廣性行為。而香港政府與社會各界人士在應對虛假資訊的舉措中，不僅包括促請政府立法打擊、限制虛假資訊(香港立法會，2021)，設立事實核查(fact-checking)機制來糾正虛假資訊，還包括利用多種媒介平台(官方或非官方)宣傳、推廣正確疫情資訊。⁵不過，這些舉措多集中在機構層面(如政府或新聞媒體)，而較少關注個人層面市民的感知與行為。而要有效應對疫情虛假資訊，市民在個人層面的理解、配合與行動也不容忽視。依據IPI理論在其他場景中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推測，當人們預設疫情虛假資訊會對他人產生影響時，他們可能會調整自己的態度與行為來對抗、扭轉潛在的有害後果，這不僅包括支持政府限制虛假資訊，也可能包括糾正虛假資訊以及推廣正確資訊等。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人們所預設的虛假資訊對他人的影響可以預測受訪者(a)支持政府限制虛假資訊、(b)糾正虛假疫情資訊的行為，以及(c)推廣正確疫情資訊的行為。

資訊處理理論

「資訊處理理論」源自於認知心理學，這個理論將人們視為一個資訊處理系統，能夠主動選擇環境中的信息，並經由內在的心智活動進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行處理和貯存，以備需要時檢索和提取 (Lang, 2000)。根據這一理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發展出較為穩定的「資訊處理策略」(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rategy)，以應對所遇到的種類繁多、數量龐大的資訊，並利用這些資訊作出決策和指導自己的行為 (Fleming et al., 2006; Kosicki & McLeod, 1990)。傳播學研究，尤其是關於「從新聞中學習」(learning from the news) 這一研究取向 (Eveland, 2001; Kosicki & McLeod, 1990; Wei & Lo, 2008)，廣泛借鑒了資訊處理理論。

I. 思考作為一種資訊處理策略

Eveland 等學者整合認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與傳播學研究，提出「認知中介模型」(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重點關注兩種資訊處理策略——「注意」(attention) 與「思考」(elaboration) (Eveland, 2001; Eveland et al., 2003)。「注意」指的是受眾對於媒介內容的注意程度，強調的是受眾的腦力集中程度；而「思考」則更進一步，強調受眾將新的資訊內容與記憶中已有知識或過往經驗建立關聯的能力 (Eveland, 2001, 2002)。通過這種關聯，新的資訊內容變得更容易提取，因而會產生更佳的記憶與學習效果。從理論上來講，人們的思考行為通常發生在注意某些資訊後，因為注意可以促使人們對資訊進行進一步思考，而思考直接影響著資訊處理的「深度」(depth) (Eveland, 2002)。相關實證研究也發現，思考比注意能更直接、有效地預測特定公共事務的知識 (李宗亞等，2019；Wei & Lo, 2008)。因此，本研究認為，思考作為一種資訊處理策略會在人們對虛假資訊的認知處理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II. 媒介接觸、思考與預設影響

早期的傳播研究常以「媒介接觸量」(時間、頻率)作為檢視媒介效果的主要預測變量，但批評者認為更多的媒介接觸並不必然帶來更多的學習與效果 (Fleming et al., 2006)，而是需要考慮受眾的認知與資訊處理過程。換句話說，媒介接觸除了可能直接引發媒介效果外，還可能透過多種資訊處理策略——如「注意」、「思考」等——來間接產生效果。例如，Wei 與 Lo (2008) 對美國 2006 年中期選舉的研究發現，媒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介接觸不僅可以直接影響美國民眾的選舉知識，還可以透過新聞注意與思考來間接影響選民的知識。此外，Fleming等人(2006)對密蘇里居民的調查也發現，思考性活動在媒介接觸與公眾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之間起到認知中介作用：媒介接觸越多，媒介思考越多，人們對食品安全的議題也就越關注。

不過，許多運用資訊處理理論的媒介效果研究往往停留在知識層面，而較少關注知識增長是否會進一步引發態度與行為變化。近年來不少健康傳播的研究發現，當人們對某一健康議題的知識增加之後，相關的態度與行為也會隨之改變(Ho et al., 2013; Lin et al., 2016)。比如，在中國大陸，對乳腺癌相關知識越多的女性更願意進行乳腺癌篩查(Zhang & Yang, 2021)。Ho等人(2013)在新加坡進行的研究也發現，市民對於H1N1新型流感的新聞注意與思考可以增加他們的流感知識，而獲得更多知識的市民更可能採取流感預防措施。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也在呼籲，「認知中介模型」需要超越對知識層面的單一關注，考慮將行為意圖與變化作為第二個可能的因變量(Ho et al., 2013; Li et al., 2021; Lo et al., 2022)。

此外，思考不僅可以通過促進知識增長來影響態度與行為，也可能透過對他人的預設影響來引發態度與行為改變。例如，一些有關第三人效果的研究發現，新聞注意與思考的層次越高，受訪者所預設的該資訊對自身以及對他人的影響都會越大(Wei et al., 2010)。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當受訪者對某則資訊賦予更多思考時，他們更有可能將這些資訊與已有知識或經驗進行連結，也就越有可能去評估這則資訊對自己及他人的潛在影響。比如，在新冠疫情的語境下，當香港市民對疫情虛假資訊的思考越多時，他們可能會聯想到香港經歷過的SARS疫情以及其他流感疫情，而對疫情更為擔憂，從而預設其他市民可能會被新冠虛假資訊誤導。不過，已有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第三人效果或IPI研究較少關注「思考」這樣的資訊處理變量如何中介「媒介接觸」與「預設影響」以及「態度與行為改變」之間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整合IPI理論模型與資訊處理變量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探究新冠虛假資訊的複雜認知處理過程。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結合上述文獻，我們推測，在對疫情虛假資訊的認知處理過程中，更多的媒介接觸會引發更多的思考活動；而當人們對某則資訊的思考越多時，他們不僅會獲得更多知識，而且更有可能分析與評判這則資訊對自己及他人的潛在影響。更進一步，這些深度資訊處理過程有可能會在態度與行為層面對人們產生影響。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個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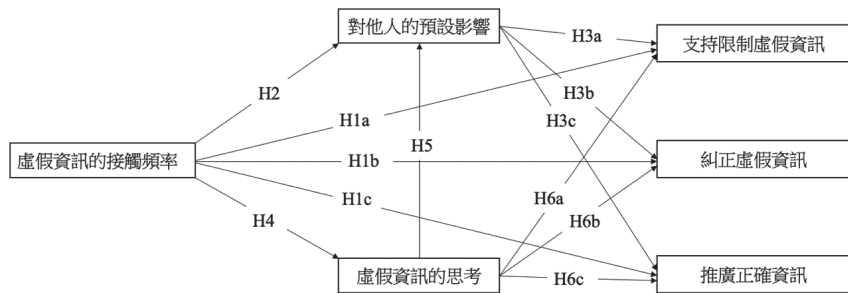
H4：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可以預測「對虛假資訊的思考」。

H5： 對虛假資訊的思考可以預測受訪者所預設的虛假資訊對他人的影響。

H6： 對虛假資訊的思考可以預測受訪者 (a) 支持政府限制虛假資訊、(b) 糾正虛假疫情資訊的行為，以及 (c) 推廣正確疫情資訊的行為。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合預設影響之影響與資訊處理策略，提出一個整合模型，如圖一。

圖一 關於虛假資訊的接觸、思考、預設影響與行為的整合模型



研究方法

抽樣及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用網絡問卷的方式對 18 歲及以上的香港市民進行配額抽樣 (quota sampling)。此項研究的資料屬於我們針對亞洲四個地區 (香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港、台灣、中國大陸，以及新加坡)的一項大型比較研究的一部分，我們委託國際調查公司Dynata執行了此次問卷調查，調查時間為2021年8月4日至8月18日。在對香港的問卷調查中，Dynata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進行配額抽樣，最終回收1,017份有效問卷。其中，男性有459人，佔45.13%，女性有558人，佔54.87%。問卷參與者平均年齡為39.48歲(標準差=1.312)，其中，18至24歲佔15.83%，25至34歲佔23.80%，35至44歲佔24.18%，45至54歲佔19.96%，55歲及以上佔16.22%。就學歷而言，初中學歷及以下佔2.75%，高中學歷佔23.10%，專科學歷佔14.35%，本科學歷佔51.72%，研究生學歷及以上佔8.06%。家庭收入分布為：19,999港幣及以下(10.82%)，20,000至39,999港幣(26.84%)，40,000至59,999港幣(26.94%)，60,000至79,999港幣(20.64%)，80,000至99,999港幣(8.35%)，100,000港幣及以上(6.39%)。

研究變量與測量方法

I. 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

本研究通過詢問受訪者是否接觸過五則具體的新冠虛假資訊來測量他們對該類資訊的接觸頻率。首先，本研究搜集了香港地區重要的事實核查(fact-checking)平台如「求驗傳媒」、「傳真社」等刊登的關於新冠疫情的虛假資訊，並從中挑選出五則傳播較為廣泛的虛假資訊，包括(1)蚊蟲可以傳播新冠病毒、(2)5G信號塔可以傳播新冠病毒、(3)喝酒可以殺死新冠病毒、(4)非滅活類的新冠疫苗會改變人類基因和(5)亞洲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在問卷調查中，我們首先告知受訪者這五則是一些曾在媒體上出現的虛假資訊，然後詢問他們是否曾經在網絡或者社交媒體上接觸過這些資訊，以此來測量他們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測量採用四點李克特量表(4-Point Likert Scale)，答案範圍從「從未」=1分，到「經常」=4分。

通過運用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本研究發現這五個題目呈現一個面向，共可解釋61.12%的變異量(eigenvalue = 3.06, Cronbach's alpha = .84)。因此，我們把受訪者在這五個題目上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的得分加總除以五，建構「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這一指標（平均數 = 1.72，標準差 = .68）。

II. 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思考

參照過去的研究 (Wei et al., 2010; Cheng & Luo, 2021)，本研究通過詢問受訪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陳述句，來測量他們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思考：在接觸到新冠疫情虛假資訊之後，(1) 我曾思考過虛假資訊的問題；(2) 我曾思考過虛假資訊對疫情的影響；(3) 我曾思考過虛假資訊可能造成的後果；(4) 我經常思考疫情虛假資訊與我所知的其他疫情資訊的關係。測量採用五點李克特量表，答案範圍從「非常不同意」= 1分，到「非常同意」= 5分。通過主成分因素分析，我們發現這四個題目呈現一個面向，共可解釋62.37%的變異量 (eigenvalue = 2.50, Cronbach's alpha = .80)。於是，我們把這四個題目加總除以四，建構「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思考」這一指標（平均數 = 3.59，標準差 = .68）。⁶

III.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對他人的預設影響

本研究通過三個題目來測量受訪者所預設的新冠虛假資訊對他人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詢問受訪者，接觸新冠虛假資訊會不會對「一般民眾」的下列方面有所影響：(1) 對疫情現狀的理解；(2) 對疫情發展的理解；和(3) 對新冠病毒的知識。受訪者回答方式為五點李克特量表（從「完全沒有影響」= 1分，到「有非常大的影響」= 5分）。主成分因素分析顯示這三個題目呈現同一個面向，可解釋77.50%的變異量 (eigenvalue = 2.33, Cronbach's alpha = .85)。我們進而把這三個題目加總除以三，建構「新冠虛假資訊對他人的預設影響」這一指標（平均數 = 3.50，標準差 = .77）。

IV. 支持政府限制新冠疫情虛假資訊

參照已有研究 (Cheng & Luo, 2021)，本研究通過詢問受訪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陳述句，來測量他們是否支持政府限制新冠虛假資訊：(1) 支持政府監管新冠虛假資訊；(2) 支持政府依法審查新冠虛假資訊；和(3) 支持政府制定相關法規來遏制新冠虛假資訊的擴散。測量採用五點李克特量表，答案從「完全不支持」= 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分，到「非常支持」= 5分。通過主成分因素分析，我們發現這三個題目呈現同一個面向，可解釋87.20%的變異量 (eigenvalue = 2.62, Cronbach's alpha = .93)。因此，我們把這三個題目加總除以三，構成「支持政府限制新冠疫情虛假資訊」這一指標 (平均數 = 3.44，標準差 = 1.12)。

V. 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糾正行為

本研究通過以下五個問題來測量受訪者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糾正行為：新冠疫情期間，接觸到新冠疫情虛假資訊之後，您是否經常 (1) 發布資訊提醒他人有關新冠疫情的虛假資訊；(2) 發布資訊駁斥有關新冠疫情的虛假資訊；(3) 發布資訊更正有關新冠疫情的虛假資訊；(4) 發布資訊分享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批評；和 (5) 核實有關新冠疫情的虛假資訊。測量採用四點李克特量表，答案範圍從「從未」= 1分，到「經常」= 4分。主成分因素分析顯示這五個題目呈現同一個面向，可解釋66.50%的變異量 (eigenvalue = 3.33, Cronbach's alpha = .87)。於是，我們把這三個題目加總除以三，構成「對新冠疫情正確資訊的對抗」這一指標 (平均數 = 2.22，標準差 = .73)。

VI. 對新冠疫情正確資訊的推廣行為

本研究通過以下三個問題來測量受訪者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推廣行為：新冠疫情期間，接觸到新冠疫情虛假資訊之後，您是否經常 (1) 分享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正確信息；(2) 分享醫學專家提供的正確信息；和 (3) 分享查證後的正確信息。測量採用四點李克特量表，答案範圍從「從未」= 1分，到「經常」= 4分。主成分因素分析顯示這三個題目呈現同一個面向，可解釋78.93%的變異量 (eigenvalue = 2.37, Cronbach's alpha = .87)。因此，我們把這三個題目加總除以三，構成「對新冠疫情正確資訊的推廣」這一指標 (平均數 = 2.40，標準差 = .84)。

VII. 控制變量

本研究測量的人口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這四個變量在迴歸分析中將作為控制變量，因為過去的研究顯示，這些變量可能影響受訪者對虛假資訊的感知與態度。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數據分析

為驗證虛假資訊的接觸與思考對他人預設影響之影響 (H2、H4 和 H5)，我們進行了兩次階層迴歸分析。兩次分析中，第一階層均輸入人口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收入；第二階層均輸入對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除此之外，在第二次分析中，我們增加第三階層，並輸入對虛假資訊的思考。

表一 預測虛假資訊的「思考」及「預設影響」之階層迴歸分析

	虛假資訊的思考	對他人的預設影響
預測變量		
第一階層		
性別	.01	-.03
年齡	-.02	.04
教育程度	.13***	.04
收入	.09*	-.03
Adjusted R^2	.04	.01
第二階層		
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	.13***	.12***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1	.02
第三階層		
虛假資訊的思考	--	.43***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	.17
Total Adjusted R^2	.05	.21

註：(1) 表內資料為標準化迴歸系數；(2) * $p < .05$ ；** $p < .01$ ；*** $p < .001$

如表一所示，本研究發現，人口變量中的教育程度 ($\beta = .13, p < .001$) 與收入 ($\beta = .09, p < .05$) 可以顯著預測對虛假資訊的思考，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收入更高的受訪者對虛假資訊的思考程度更深。這說明，高收入、高知識人群更有可能對於虛假信息進行深度的資訊處理。此外，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可以顯著預測虛假資訊的思考 ($\beta = .13, p < .001$) 與對他人的預設影響 ($\beta = .12, p < .001$)；接觸越多，思考越深，越認為他人受到的影響更大，因此，H2與H4得到驗證。另外，在控制人口變量與虛假資訊的接觸之後，虛假資訊的思考對他人的預設影響具有顯著預測力 ($\beta = .43, p < .001$)，H5得到有力支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為驗證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思考、預設影響對三種行為的影響(H1、H3和H6)，我們進行了三次階層迴歸分析。三次分析中，第一階層均輸入人口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收入；第二階層均輸入對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第三階層均輸入對虛假資訊的思考；第四階層均輸入對他人的預設影響。因變量依次為支持政府限制虛假資訊、對虛假資訊的糾正，以及對正確資訊的推廣。

表二 預測三種行為模式之階層迴歸分析

	限制虛假資訊	糾正虛假資訊	推廣正確資訊
預測變量			
第一階層			
性別	-.10*	.01	.00
年齡	.14***	-.12***	-.03
教育程度	-.10*	.02	.00
收入	.04	.05	.05
Adjusted R^2	.02	.05	.02
第二階層			
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	.15***	.37***	.32***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4	.17	.13
第三階層			
虛假資訊的思考	.17***	.21***	.18***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6	.06	.05
第四階層			
對他人的預設影響	.20***	.10**	.15***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3	.01	.02
Total Adjusted R^2	.16	.28	.22

註：(1) 表內資料為標準化迴歸系數；(2) * $p < .05$ ；** $p < .01$ ；*** $p < .001$

如表二所示，本研究發現，性別 ($\beta = -.10, p < .05$)、年齡 ($\beta = .14, p < .001$) 與教育程度 ($\beta = -.10, p < .05$) 等三個人口變量都可以顯著預測對政府限制虛假資訊的支持。具體而言，女性比男性，以及年長者比年輕人更傾向於支持政府對疫情虛假資訊進行限制；而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支持政府對虛假資訊進行限制。此外，年齡與糾正性行為成負相關：年齡越大，越不會去糾正有關疫情的虛假資訊。推廣正確資訊的行為與四項人口變量均沒有顯著關係。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此外，迴歸結果發現，對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可以顯著預測三種行為(限制性： $\beta = .15, p < .001$ ；糾正性： $\beta = .37, p < .001$ ；推廣性： $\beta = .32, p < .001$)，H1得到驗證。虛假資訊的思考也是三種行為模式的顯著預測變量(限制性： $\beta = .17, p < .001$ ；糾正性： $\beta = .21, p < .001$ ；推廣性： $\beta = .18, p < .001$)，H6得到驗證。另外，迴歸結果還發現，對他人的預設影響可以正向預測三種行為模式(限制性： $\beta = .20, p < .001$ ；糾正性： $\beta = .10, p < .01$ ；推廣性： $\beta = .15, p < .001$)，H3得到有力支持。不過，相對於限制性行為，對他人的預設影響對糾正性及推廣性行為的預測力度稍弱一些。

結論與討論

基於對香港市民的問卷調查，本研究試圖考察疫情虛假資訊的媒介接觸如何影響對虛假資訊的思考以及對他人的預設影響，並進一步探究它們可能帶來的態度與行為後果。本研究發現，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既可以直接影響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三種態度與行為——對虛假資訊的限制與糾正，以及對正確資訊的推廣——也可以透過「對虛假資訊的思考」與「對他人的預設影響」來間接預測這三種態度與行為。大體而言，受訪者對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越高、思考越深、對他人的預設影響越大，他們就越傾向於支持政府對虛假資訊進行限制，也越可能去糾正虛假資訊以及推廣正確資訊。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是，我們整合 IPI 與「資訊處理理論」這兩種理論，並將其運用到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研究中，拓展了這兩個理論的適用範圍。我們的研究證實了人們對虛假資訊的認知處理與反應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接觸頻率雖然是預測態度與行為變化的顯著變量，但它只能提供一部分解釋；實際上，預設影響的認知與資訊處理策略可以中介虛假資訊接觸頻率與態度行為變化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證實，對他人的預設影響可以顯著預測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三種態度與行為模式。以往對第三人效果以及 IPI 的研究普遍關注負面資訊內容(如暴力、色情、飲酒)，因而在態度行為層面多集中討論對這些負面內容的限制與糾正性行為。對此，本研究也有相似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現：當香港市民感知到虛假資訊會對他人產生影響時，他們不僅會支持政府對虛假資訊進行限制，也會試圖去糾正這些虛假資訊。不過，本研究同時發現，對他人的預設影響還可能促使人們去分享與推廣正確的疫情資訊。這可能是由於，當香港市民認為有關疫情的虛假資訊會對公眾造成較大影響時，他們不僅希望限制與糾正疫情虛假資訊，更希望通過分享與推廣正確資訊來進一步扭轉虛假資訊可能帶來的不良社會後果。不管是分享醫學專家、世界衛生組織，或是其他渠道發布的正確資訊，香港市民可能希望通過這類推廣性行為來降低、甚至抵消虛假資訊的有害影響。

另外，本研究還發現，對虛假資訊的思考可以預測對他人的預設影響，進而影響市民的態度與行為策略。這可能是因為，當人們對虛假資訊進行深度思考時，他們更可能依據已有的知識與經驗，更進一步思考這些虛假資訊對自己及他人的潛在影響，因而會採取行動。例如，對疫苗虛假資訊的思考可能會引發人們擔憂公眾會被這類資訊誤導，懷疑疫苗的功效，或者擔心疫苗的副作用，從而拒絕注射疫苗。因此，對疫苗虛假資訊的思考與對他人的預設影響可能會促使人們支持政府限制疫苗虛假資訊，或者在社交媒體上糾正有關疫苗的虛假資訊，並推廣正確的疫苗資訊。

上述發現對虛假資訊的政策與管理具有重要啟示。首先，本研究的亮點之一在於證實人們在接觸虛假資訊之後，不僅關注「自身」處境，還會一併思考這類資訊對「他人」的影響，進而調整自己的態度與行為。針對這樣的資訊處理機制，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宣導與說服策略時，可採用引發人們「為他人著想」的訊息設計，促使人們思考，身邊的家人和朋友若接觸到這類虛假資訊可能遭受的不良後果，以此增強勸服效果。例如，若想更有效地爭取市民對於新冠疫苗相關謠言與虛假資訊的規管與限制，可以強調這類虛假資訊可能會加劇父母與身邊長者的疫苗猶豫，使得原本免疫力就較低的這一群體在面對新冠時更加脆弱。另外，鑒於並不是所有人都會支持通過立法來規管虛假資訊，政府可以考慮將立法與非立法措施兼行並施。除了通過特定法例來限制、打擊虛假資訊外，還可以考慮非立法性措施，如增加事實核查的平台、拓寬正確資訊的發布渠道與範圍，以方便市民對相關資訊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進行查驗、糾正、分享與推廣。在宣導疫情資訊事實核查的重要性時，也可以「增進家人、朋友等參考團體對疫情真貌的了解」為訴求，呼籲民眾對查核過的資訊多加支持並進行轉發與傳播。另外，政府與媒體在發布、分享疫情資訊時，可以運用多媒體形式來提高民眾對其的興趣與注意，進而促進他們對疫情資訊的關注與思考。

此外，本研究發現高收入以及教育程度高的香港市民更可能對虛假資訊進行深度思考，這可能是因為新冠病毒資訊涉及醫學專業知識，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在資訊處理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挑戰。對此，政府與相關組織可以通過一些公益性、教育性的社會活動來提高一般市民的健康知識與媒介素養。例如，對於老年人或貧困人口比較集中的社區，政府可以增加一些公益講座，普及有關新冠病毒傳播與預防的健康知識，分享鑒別虛假資訊的方法與技能。在設計相關宣傳手冊時，儘量將專業知識轉化為通俗易懂的平民語言，方便不同教育程度的市民理解自身處境與疫情真貌。

最後，我們需要指出，本研究存在一些研究局限。首先，我們測量虛假資訊接觸頻率的題目，只選取了五則在香港和亞洲地區較為常見的疫情虛假資訊，層次較為單一。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結合其他測量方法多層次地測量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另外，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只考察了「思考」這一種資訊處理策略，並未探討其他資訊處理變量是否可能影響虛假資訊的預設影響與行為模式。未來研究可通過替換或增加新的資訊處理變量（如「注意」）來繼續拓展這一模型。此外，本研究以香港市民為研究樣本。香港資訊發達、人均收入與受教育水平較高、對政府信任度低，在新冠疫情期間，香港社會採取了多項措施應對疫情以及虛假資訊，這些都可能影響人們對虛假資訊的感知以及行為反應。因此，本研究的發現能否推論至其他社會不得而知，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地區、城市進行比較性研究，不僅包括香港、新加坡、上海這樣的亞洲城市，也可以將亞洲城市與西方社會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最後，本研究為橫切面式的調查（cross-sectional survey），分析的結果無法建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其他方法（如實驗）來探究媒介接觸、思考、預設影響與行為模式之間的因果關係。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5期(2023)

註釋

- 1 參見《香港01》新聞報道：<https://www.hk01.com/> 社會新聞/430623/武漢肺炎-網傳超市缺貨市民搶購廁紙日用品-惠康澄清僅屬流言。
- 2 詳細報告可以參見：https://research.hkbu.edu.hk/f/page/20480/21656/GovDebunking_Report01_Xinzhi_chi_v3.pdf。
- 3 具體可參閱《2020年路透社研究所數碼新聞報告》：<https://www.digitalnewsreport.org/survey/2020>。
- 4 詳細報告可參閱：<https://www.ipsos.com/en/2019-cigi-ipsos-global-survey-internet-security-and-trust>。
- 5 詳細信息可參閱香港政府為新冠病毒設立的官方網站：<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
- 6 本研究在最初設計問卷時，統一採用的是五點量尺。不過，根據兩輪前測(pre-test)之後的反饋，我們將頻率測量的題目調整為四點量尺。這是因為，此項研究是我們針對亞洲四個地區(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以及新加坡)的一項大型比較研究的一部分。在問卷設計時，我們不僅要考慮測量的一致性，也要考慮中英文以及簡體、繁體中文之間的對應和連貫。在進行前測之後，我們得到反饋，關於英文問卷中測量頻率的五個量尺——「Never—Rarely—Sometimes—Often—Always」，並不是所有受訪者都清晰懂得「Often」與「Always」之間的微妙區別，所以若採用四點量尺可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疑惑。因此，我們根據自己四地比較的研究需求，將頻率測量相關的題目改為四點量尺，主要目的是在減少歧義的情況下保持中英文問卷之間的對應性。不過，儘管量尺不同，也不會影響統計結果。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李宗亞、羅文輝、盧鴻毅、魏然(2019)。〈資訊處理策略與政治討論對賽局性知識與實質性知識的影響〉。《中華傳播學刊》，第36期，頁117–155。
- Li Zongya, Luo Wenhui, Lu Hongyi, Wei Ran (2019). Zixun chuli celüe yu zhengzhi taolun dui saijuxing zhishi yu shizhixing zhishi de yingxiang.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36, 117–155.
- 香港立法會(2021年7月21日)。〈民政事務局局長就「立法打擊網上虛假資訊」議員議案總結發言〉。GovHK 香港政府一站通。上網日期：2021年9月10日，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7/21/P2021072100709.htm>。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Xianggang Lifahui (2021, July 21). Minzhengshiwuju juzhang jiu 'lifa daji wangshang xujia zixun' yiyuan yan zongjie fayan. *GovHK Xianggang Zhengfu yizhantong*.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21, fro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7/21/P2021072100709.htm>.

楊澄瑋 (2021年4月26日)。〈打擊假新聞，提升全民媒體素養〉。《香港01》。上網日期：2021年9月8日，取自 <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617253/打擊假新聞-提升全民媒體素養>。

Yang Yingwei (2021, April 26). Daji jiixinwen, tisheng quanmin meiti suyang. *Xianggang 01*. Retrieved September 8, 2021, from <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617253/打擊假新聞-提升全民媒體素養>.

羅文輝、蘇蘅 (2011)。〈媒介暴露與資訊處理策略對新流感相關知識的影響〉。《新聞學研究》，第107期，頁173–206。

Luo Wenhui, Su Heng (2011). Meijie baolu yu zixun chuli celüe dui xinliugan xiangguan zhishi de yingxiang. *Xinwenxue yanjiu*, 107, 173–206.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Baek, Y. M., Kang, H., & Kim, S. (2019). Fake news should be regulated because it influences both “others” and “me”: How and why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model should be extended.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2(3), 301–323.

Barnidge, M., & Rojas, H. (2014). Hostile media perceptions,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and political talk: Expanding the corrective action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6(2), 135–156.

Bursztyjn, L., Rao, A., Roth, C. P., & Yanagizawa-Drott, D. H. (2020). *Misinformation during a pandemic* (NBER Working Paper No. 2741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7417/w27417.pdf

Chang, C. (2022).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effects of early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on personal empower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alth Communication*, 37(4), 476–489.

Cheng, Y., & Luo, Y. (2021). The presumed influence of digital misinformation: Examining US public's support for governmental restrictions versus corrective action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45(4), 834–852.

Cho, H., Shen, L., & Peng, L. (2021). Examining and extending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hypothesis in social media. *Media Psychology*, 24(3), 413–435.

Chung, S., & Moon, S. I. (2016). Is the third-person effect real?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rationales, testing methods, and previous findings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on censorship attitud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2), 312–337.

- Cohen, J., & Tsfaty, Y. (2009).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on strategic vot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3), 359–378.
- Davison, W. P. (1983).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1), 1–15.
- Eveland Jr, W. P. (2001). The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 of learning from the news: Evidence from nonelection, off-year election,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ntex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5), 571–601.
- Eveland Jr, W. P. (2002). New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s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ivation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1), 26–40.
- Eveland Jr, W. P., Nathanson, A. I., Detenber, B. H., & McLeod, D. M. (1999). Rethinking the social distance corollary: Perceived likelihood of exposure and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3), 275–302.
- Eveland Jr, W. P., Shah, D. V., & Kwak, N. (2003). Assessing causality in the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 A panel study of motivation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learning during campaign 2000.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4), 359–386.
- Featherstone, J. D., & Zhang, J. (2020). Feeling angry: The effects of vaccine misinformation and refutational messages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vaccination attitud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5(9), 692–702.
- Fleming, K., Thorson, E., & Zhang, Y. (2006). Going beyond exposure to local news media: 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examination of public perceptions of food safety.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1(8), 789–806.
- Freelon, D., & Wells, C. (2020). Disinformation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7(2), 145–156.
- Gunther, A. C., & Storey, J. D. (2003).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2), 199–215.
- Gunther, A. C., Bolt, D., Borzekowski, D. L. G., Liebhart, J. L., & Dillard, J. P. (2006). Presumed influence on peer norms: How mass media indirectly affect adolescent smok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1), 52–68.
- Ho, S. S., Goh, T. J., & Leung, Y. W. (2022). Let's nab fake science news: Predicting scientists' support for interventions using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model. *Journalism*, 23(4), 910–928.
- Ho, S. S., Peh, X., & Soh, V. W. (2013). The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 Factors influencing public knowledge of the H1N1 pandemic and intention to take precautionary behavior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8(7), 773–794.
- Ho, S. S., Poorisat, T., Neo, R. L., & Detenber, B. H. (2014). Examining how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affects social norms and adolescents' attitudes and drinking behavior intentions in rural Thailand.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9(3), 282–302.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 Hoffner, C., & Buchanan, M. (2002). Parents' responses to television violence: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parental mediation and support for censorship. *Media Psychology*, 4(3), 231–252.
- Hoffner, C. A., & Cohen, E. L. (2015). Portrayal of mental illness on the TV series *Monk*: Presumed influ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exposure. *Health Communication*, 30(10), 1046–1054.
- Hong, Y. (2023). Extending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hypothesis: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for HIV preven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38(4), 765–778.
- Koo, A. Z. X., Su, M. H., Lee, S., Ahn, S. Y., & Rojas, H. (2021). What motivates people to correct misinformation?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hird-person perceptions and perceived norm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5(1), 111–134.
- Kosicki, G. M., & McLeod, J. M. (1990). Learning from political news: Effects of media images and information-processing strategies. In S. Kraus (Ed.),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p. 69–83). Erlbaum.
- Lang, A. (2000). The limited capacity model of mediated message process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1), 46–70.
- Li, Z., Wei, R., Lo, V. H., Zhang, M., & Zhu, Y. (2021). Cognitive reasoning, risk targets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COVID-19 outbreaks among Wuhan residents during lockdow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5), 355–372.
- Liao, Y., Ho, S. S., & Yang, X. (2016). Motivator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xamining the underlying processes in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model. *Science Communication*, 38(1), 51–73.
- Lin, T. T. C., Li, L., & Bautista, J. R. (2016). Examining how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relate to Singaporean youths' perceived risk of haze and intentions to take preventive behaviors. *Health Communication*, 32(6), 749–758.
- Lo, V. H., & Wei, R. (2002). Third-person effect, gender, and pornography 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6(1), 13–33.
- Lo, V. H., & Wei, R. (2005). Exposure to Internet pornography and Taiwanese adolescents'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9(2), 221–237.
- Lo, V. H., Wei, R., Lu, M., Zhang, G., & Qiu, J. L. (2022, May 26–3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resumed influence on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COVID-19 misinformation in Asia. The 72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 Annual Conference, Paris, France.
- Perloff, R. M. (2009). Mass media, social perception, and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J. Bryant & M. B. Oliver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 pp. 252–268). Routledge.

- Rojas, H. (2010). “Corrective” actions in the public sphere: How perceptions of media and media effects shape political behavi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2(3), 343–363.
- Schmierbach, M., Boyle, M. P., Xu, Q., & McLeod, D. M. (2011). Exploring third-person differences between gamers and nongamer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2), 307–327.
- Sun, Y., Chia, S. C., Lu, F., & Oktavianus, J. (2022). The battle is on: Factors that motivate people to combat anti-vaccine misinforma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37(3), 327–336.
- Sun, Y., Pan, Z., & Shen, L. (2008a). Understanding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8(2), 280–300.
- Sun, Y., Shen, L., & Pan, Z. (2008b). On the behavioral component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2), 257–278.
- Tal-Or, N., Cohen, J., Tsfati, Y., & Gunther, A. C. (2010). Testing causal direction in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7(6), 801–824.
- Wang, S., & Kim, K. J. (2020). Restrictive and corrective responses to uncivil user comments on news websites: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4(2), 173–192.
- Wardle, C., & Derakhshan, H. (2018). Thinking about “information disorder”: Formats of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mal-information. In C. Ireton & J. Posetti (Eds.), *Journalism, fake news & disinformation* (pp. 43–54). UNESCO.
- Wei, R., & Lo, V. H. (2008). News media use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2006 US midterm elections: Why exposure matters in voter lea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3), 347–362.
- Wei, R., Lo, V. H., & Golan, G. (2017).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umed influence of US news about China and the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global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2964–2981.
- Wei, R., Lo, V. H., & Lu, H. Y. (2008). Third-person effects of health new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edia exposure,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2(2), 261–277.
- Wei, R., Lo, V. H., & Lu, H. Y. (2010). The third-person effect of tainted food product recall news: Examining the role of credibility, attention, and elabor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3–4), 598–614.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September 23). *Managing the COVID-19 infodemic: Promoting healthy behaviours and mitigating the harm from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news/item/23-09-2020-managing-the-covid-19-infodemic-promoting->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

healthy-behaviours-and-mitigating-the-harm-from-misinformation-and-disinformation

- Xu, J., & Gonzenbach, W. J. (2008). Does a perceptual discrepancy lead to action? A meta-analysis of the behavioral component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3), 375–385.
- Yang, X., Wei, R., & Ho, S. S. (2021). If others care, I will fight climate change: An examination of media effects in addressing the public goods dilemma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 3315–3335.
- Zhang, L., & Yang, X. (2021). Linking risk perception to breast cancer examination intention in China: Examining an adapted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 *Health Communication*, 36(14), 1813–1824.

本文引用格式

路淼、羅文輝、魏然 (2023)。〈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5 期，頁 191–217。